



□ 牛志奇

水利是起源古老且历史悠久的公共事业，是在自然生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类活动。作为儒家经典，《周礼》主要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风俗、礼法诸制，其中涉及水利内容主要在《夏官司马·大驭》《地官司徒·遂人》《地官司徒·草人》《秋官司寇·司隶》等篇中。《周礼》是中国古代最早阐释水利与自然、水利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文献，最早制定了中国古代全面的水利典章制度，设立了水官并阐释了沟渠与井田的关系，规划出理想的农田灌溉工程体系。

水官的设置及其职责

《周礼·太宰》明确记载了虞衡制度：“以九职任万民：……三曰虞衡，作山泽之材。”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在《周礼注疏》中也进一步明确：“虞衡，掌山泽之官，主山泽之民者。”虞衡制度的设立，表明先秦时期的水管理从对山川江河的认知，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的制度安排，进而通过设置专门的机构、职官，颁布有关保护山林川泽的政策法令，规范社会生产活动，约束人们的行为，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。

虞衡制度的核心之一是水官的设置，这是国家水行政管理体系的雏形，为历朝历代的国家水行政管理体制作出了先导性、制度性的安排。水官的设置体现在《地官司徒·草人》中：“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，而平其守”“泽虞掌国泽之政令，为之厉禁”。“川衡”就是管理河流的官员，“泽虞”是管理湖泊的官员，其主要职责是颁布保护河流湖泊的政策法令，并履行监督处罚职责，保护水资源。“川衡”（河官）的职责除了负责掌管巡视河流，并执行有关的禁令外，还“以时舍其守，犯禁者，执而诛罚之”，讲的是：合理安排守护河流的民众，按时安置守护人，有违反禁令的就抓捕而加以惩罚。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：一是周代把河流视为公共资源，设专官管理，是执法主体；二是对民众的行为予以了规范，通过严苛的惩罚禁令保护河流。可以看出，水管理的水权意识和法制理念在先秦时期已经具备，并上升到了国家法制的层面。

“泽虞”的职责除了掌管湖泽的有关政令外，还“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，以时入之于玉府，颁其余于万民”，讲的是：划分湖泽的范围，设置藩界和禁

令，使当地的民众守护湖泽里的资源，按时缴纳皮、角、珠贝等给玉府（玉府是朝廷掌管玉的机构），其余的财物分归民众所有。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：一是国家对湖泽的管理是划定保护范围并制定法令；二是对湖泽里各种资源进行分配，有上缴国家的品目（比如：珠贝），其余留给老百姓。这种分配方式强调要处理好国家与个人对资源的分配，除交给国家的指定物品外，其余的全归老百姓所有，呈现出周朝的资源分配制度特色，也是西周“民为邦本、本固邦宁”的民本思想在分配制度中的具体反映。《周礼》不仅留给后世内容丰富的自然史，也蕴含着中国古代的生态观以及对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价值观。

“职方氏”与河流湖泊管理

《周礼·职方氏》记载：“职方氏掌天下之图，以掌天下之地。”职方氏是掌管国家地域的官职，所管辖的全国国土地域共划分为九个州，分别是扬州、荊州、豫州、青州、兖州、雍州、幽州、冀州、并州，然后将各州的水资源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归纳，作为国家水资源管理的指南。《职方氏》一一列举各州的疆域和水资源分布情况，将九州的水资源分为泽数、川、浸三种类型：泽数是人们从事水产和渔业的水域湖泊；川是可以通水运的江河水道；浸特指有灌溉之利的塘泊或河流。如荊州：“正南曰荊州，其山镇曰衡山，其泽数曰云梦，其川江、汉，其浸潁、湛。”如青州：“正东曰青州，其山镇曰沂山，其泽数曰望诸，其川淮泗，其浸沂沭。”荊州的行政区域内有衡山，湖泊有云梦泽，河流有长江、汉江，浸有潁和湛（指今长江中游的渚水和沮漳河）；青州的行政区域内，有沂山，湖泊是望诸（今豫东和鲁南一带的古湖泊，已湮没），河流有淮河、泗水，浸有沂水、沐水。《周礼》的九州是早期中国的行政区划，与九州同时被记载的江河和湖泊，是中国疆域内最早获得命名的水体，是对中国区域水资源最早的系统阐述，也是最早的水土资源规划，并最早纳入了政府管理范畴的公共资源。这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对河流、湖泊特性及其流向的研究，为后代许多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古河流、古湖泊的消亡变化与环境的

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
农田水利体系

《周礼·匠人》记载农田水利灌溉沟渠的建造标准：“匠人为沟洫……广尺深尺，谓之畎；田首倍之，广二尺，深二尺，谓之遂；九夫为井，井间广四尺，深四尺，谓之沟；方十里为成，成间广八尺，深八尺，谓之洫；方百里为同，同间广二寻，深二仞，谓之浍。专达于川，各载其名。”根据这个记载，可以看出周朝把沟渠的名称及标准规定得非常细致：宽一尺、深一尺的叫作畎，宽二尺、深二尺叫作遂，宽四尺、深四尺的叫作沟，宽八尺、深八尺的叫作洫，宽二寻、深二仞的叫作浍，浍就直通河流了。浍、洫、沟、遂、畎与现在的干、支、斗、农、毛相对应，浍应该是现在的干渠，与河流相通。《周礼》中对农田水利灌溉沟渠体系的记载，一是标准化，对不同功能的沟渠大小、尺寸都有明确的规定；二是系统化，建立了由浍、洫、沟、遂、畎构成的水利灌溉沟渠体系，这个体系的设置十分严密和规范，不同的名称具有不同的功能。这是我国水利灌溉标准体系的开创之举，对先秦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《地官司徒·遂人》对沟洫系统以及管理有最为系统的描述：“遂人掌邦之野。凡治野，夫间有遂，遂上有径，十夫有沟，沟上有眡，百夫有洫，洫上有涂，千夫有浍，浍上有道，万夫有川，川上有路，以达于畿。”遂人，是西周时期管理乡野的官员，遂人对治下的水利公共基础设施负有管理责任，遂人的属官有管沟和径的夫，夫分十夫、百夫、千夫、万夫，按照沟洫和道路的级别和数量设置，对沟和路的分级描述，实际上是古代版的农田水利工程系统阐述。“井田制”是儒家倡导的理想田制，在周天子公田有所实施，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，沟洫原为井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将沟洫提升到“井田制”制度层面推行，体现出上古中国的治理意志和层级分明、功能明确的农田水利系统规划，代表着水利在古代中国生态文明体系中的独特标识。这是我国农田水利灌溉体系与管理的最早阐述，对西周时期“井田制”的实施起着关键的作用，也对西周乃至后代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推动着古代社会的向前发展。

云冈石窟，是公元5世纪中华各民族共铸的文化丰碑，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。它坐落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，武州川北岸。其开凿史历经70余年，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见证。

云冈石窟的开凿

大同，古称平城，后因唐代大同军驻扎于此而改名大同，取“天下大同”之意。它曾作为北魏政权的都城长达97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北魏完成了对北方山河的统一，进入了“四方无事，国富民康”的繁荣阶段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都得到了很大发展，云冈石窟便是北魏王朝为宣传其佛教文化而营造的宏伟工程。

云冈石窟依山开凿，东西延伸1公里，现存大小窟龕252个，造像51000余尊，规模宏大，内容丰富，艺术精湛，形象动人，上承秦汉文化之现实主义精华，下开隋唐艺术之浪漫主义先河，是中华石像艺术中的巅峰之作。关于石窟的开凿缘由，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载：“昙曜白帝，于京城西武州塞，凿山石壁，开窟五所，僂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饰奇伟，冠于一世。”在北魏政权的推动下，自兴安二年起，至正光五年止，云冈石窟修建期跨时70余年。

云冈石窟，既具有超越实际的想象力，又具有扎根生活的现实性，因此它是浪漫与现实、出世与入世的结合，散发着奇艳瑰丽的艺术光彩。按石窟的形制和艺术风格，可将它分作三期：第一期主要开凿于文成帝时期，第二期开凿于献文帝时期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，第三期开凿于迁都之后至孝明帝正光年间。第一、二期石窟为皇室主持开凿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，第三期为当时的一般官僚地主及各民族贵族所营造，展现了更加多样的风格。

气势宏阔的第一期洞窟

第一期洞窟，位于云冈石窟群西部，由高僧昙曜主持开凿，故又称“昙曜五窟”。5尊大佛分别象征北魏拓跋氏开国的5位皇帝。主像规模宏大、气势磅礴，容貌上肉髻高耸、方额阔颐、高鼻深目、身形健硕，气质上威武刚毅、气度凌人，与后世佛像的慈眉善目、含蓄谦恭迥然不同。特别是第20窟的露天石像，坐高13.7米，巍峨雄浑，气度庄严，有昂然大丈夫之气。把鲜卑族的坚韧与强劲、豪放与潇洒、明智与宽宏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将一种英姿勃发、刚强坚毅的气质刻入山岩，出神入化。

昙曜五窟是北魏石窟艺术中鲜卑族精神的代表，也是西域石像艺术东传的典型。这些石像身穿的袈裟，有的质料厚重、纹路凸起，具有犍陀罗（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一带）特点；有的轻薄贴体、纹路紧密，又有恒河流域的服装特征。把西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互相融合，并予以发展创造。在造像上，昙曜五窟采用“山前看山”的手法，从主像到前壁距离很短，迫使人必须仰视，给人一种顶天立地、旷世无双的感受。

华美富丽的第二期洞窟

第二期洞窟，位于云冈石窟群的东、中部。与昙曜五窟相比，此期无论是形制艺术还是造像题材，都有了较大不同，融合了汉民族文化中繁复细腻、精巧多思的特点，展现出一种富丽雍容、华美复杂的新风格。云冈石窟的本土化和世俗化，即从本期开始。从取材上看，世俗人的形象以供奉者的角色出现，造像的视角渐渐望向人间。从形制上看，此期的石像已少有第一期的那种雄伟巨像，石像面容丰瘦适中、表情温和恬淡。服装由印度式改为中国式，太和十三年前的石像多穿鲜卑族的“夹领小袖”服装，之后则出现了褒衣博带的汉式宽服。

如果说第一期石窟糅合了奇异瑰丽的异域色彩，那么第二期石窟则表现了更加华丽繁复的中原气质。它吸收了外来艺术中瑰丽的想象元素，又创造出一种繁盛发达的独特美学意境。上着帔帛、下着大裾的服装式样，取材于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的衣着，暗示着太和十年“始服衮冕”等一系列改革。大量出现的博山炉、兽面装饰、八棱柱等汉族器物，流露出民族融合的和睦气息，

清新秀雅的第三期洞窟

第三期洞窟多为中小型洞窟，以及遍布云冈的小龕，数量众多，开凿于太和十八年以后。这表明，虽然此期北魏已迁都洛阳，大规模皇家工程已经停止，但社会各层出资造像建龕的风气却蔓延开来。此期的石窟形制更加方正整齐，塔洞等均为流行窟式，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。此期的石窟少了第一期的恢宏、第二期的华丽，展现出一派清新秀雅的风貌，充分吸收了南朝的美学元素，人称“秀骨清像”。此期的石像外貌越来越清秀、纤细，长颈削肩，体态修长。服装上一律着褒衣博带，上

民族文化融合的见证——云冈石窟

□ 邓田田

穿短衫，帔帛交叉。飞天面容清秀姣好，高髻小袄，长裙曳地，帔带飞扬，舞姿婉丽。人物造型合中适度、秀雅内敛，体现出形象美与线条美的统一，具有宁静、含蓄、简洁的感染力。这种清新秀雅的艺术风格不同于第一期的恢宏壮阔、第二期的华美富丽，而更具有民间化、流行化和生动活泼的特点，绚烂多姿，其人物形象上的审美旨趣为后来的龙门等石窟所吸收和继承。

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多民族国家，发展与统一永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，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始终是历史前进的方向。文化与艺术、情感与理性，赋予了云冈石窟以鲜活的生命力，各民族的美与智慧熔铸其间，形成了这座历史久远、艺术臻善的丰碑。



“舜水先生”东渡记

□ 孙庆峰



鲁迅在《藤野先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从东京出发，不久便到一处驿站，写道：日暮里。不知怎地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。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，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。”

那么，朱舜水是何许人也？“明的遗民”又所谓何事？

一介书生投笔从戎

朱舜水（1600—1682年），名之瑜，字楚屿，号舜水，以号行于世，浙江余姚县人，与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颜元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师。朱舜水出生在一个士大夫家庭，但8岁时，父亲因病去世，家道中衰，陷入困顿。少小历经坎坷，为了

谋生，他掌握了很多实用技能。后来随大哥朱启明到松江府，拜儒学大师朱永佑、张肯堂为师。在松江，他发奋读书，加上悟性极高，很快学有所成，以“文武全才第一名”被苏松学政阮炜推荐，但他没有应征。

朱舜水所处的时代，战乱频仍，灾患不断，社会逐步陷入混乱之中。明与后金长期作战，致使国库空虚，随后不断加征辽饷补充军费，农民负担与日俱增。天启年间，陕西全境灾荒不断，发生严重干旱虫灾，饿殍遍野。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等先后起兵。1644年，李自成攻占北京城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，李自成败走，顺治帝迁都北京，清军向华北华南进军，攻打农民军和明朝余部。

朱舜水遂决定投笔从戎。1645年，朱舜水放弃独善其身的生活，但也并没有接受南明政权授予的官位，而是以一个平民百姓身份加入反清队伍。

当时，清军攻陷南京，南明弘光帝败走，随后被俘遇害。鲁王朱以海号称监国，控制浙东绍兴、宁波、舟山群岛等地，而朱舜水的主要工作，就是为鲁王筹集军饷和争取外援。

此时的中国，大部分国土已经被清军占领，朱舜水遂将争取援助的目光投向了邻国。为此，15年之间，他

先后七渡日本，六至安南、二至暹罗。当时，从浙江坐船到日本，要在海上漂泊数十天，到东南亚的安南、暹罗则要漂泊更久。在船上，面对狂风巨浪，经常面对着生死考验，但朱舜水义无反顾，甘愿历经艰难。

在海外十几年，朱舜水为明军筹集了众多军饷，但此时国内形势，却一天天向对明军不利的方向发展。先是舟山群岛失守，朱舜水的师友朱永佑、吴钟峦等人殉难。朱舜水看到清政权日趋坚固，遂打算流亡日本。

1659年冬，朱舜水乘船来到日本长崎，当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，不允许外国人长期居住。日本学者安东守约久闻朱舜水大名，递门帖拜他为师，并为之上下奔走，最后得到日本政府特准，朱舜水遂于1660年在长崎定居下来。

漂洋过海传学日本

结束十几年的奔波生活，朱舜水已是60岁的老人。他定居长崎时曾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想倡明儒学于异域，仅是为了保全名节。但由于他知识渊博、品德高尚，很快声名鹊起。

1665年，日本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派使臣小宅生顺到长崎拜

访，邀请朱舜水到首都江户（今东京）讲学。光国是德川幕府建立者德川家康的孙子，封藩在水户，但由于其与幕府将军的关系亲近，常驻江户。

朱舜水再三推让，但抵不过德川光国的再三邀请，终于应允。1660年夏，朱舜水从长崎来到江户，自此，朱舜水定居江户，偶尔去水户。在17年之间，朱舜水主要的生活就是讲学，一直持续到他离世。

江户是日本的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。朱舜水在此期间，日本学者纷纷求教，或听其讲学，或书信切磋，还有不少人拜他为师。朱舜水对学生和前来求教的人，始终热心指导，有问必答。至今在日本德川博物馆，仍然保存着朱舜水与日本学者的大量问答书信，内容涵盖礼乐文化、典章制度、修身处世、山川风物、农田播种等，可谓包罗万象。

朱舜水博古通今、诲人不倦，他教育培养的学生英才辈出，很多都成为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，如安东守约、安积觉、今井弘济、下川三省等。日本学者尊称他为“朱夫子”或“舜水先生”。

朱舜水的人品学识影响了一代日本学术学风。当时，日本学术主流崇尚佛学和理学，热衷于究心谈性、探

究佛理。朱舜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，很大程度上是士大夫空谈虚论的学风所导致。因此，他提倡实学，主张“知行合一”，认为“为学当有实力，有实用”“学问之道，贵在实行”，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得。他影响下的日本水户学派，注重经世致用，在日本思想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朱舜水非常重视史学，主张积极总结历史上发生的经验教训。德川光国组织学者编撰《大日本史》，聘请朱舜水指导。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，中心思想强调忠君爱国，对后世日本历史发展影响很大。

朱舜水既是博学多闻、知识渊博的学者，也是擅长工艺、精通技术的专家，中国工程设计、建筑园艺、医学种痘等多项知识技能都由他介绍到日本。

朱舜水主张国家间平等相处，亲如一家，他热爱中国，也说自己视日本“给为一体，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”。在给学生安东守约的信中，他希望日本“与中国世世通好，若汉赵之交”。

誉满扶桑 泽被后世

1682年，朱舜水病逝于日本江户的住所，享年82岁，随后安葬在德川

